

教學 學子 集

選堂題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二十週年紀念專刊

學
子
集

羅慷慨烈

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出版

THE AR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pyright © 1987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ponsored by T.Y. Wu Foundation

數學集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出版
吳仲亞先生學術基金贊助
版權所有© 一九八七年
ISBN 962-7152-03-X

學文 學集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二十周年紀念專刊——

目次

弁言	潘重規	一
說琴徽——答馬蒙教授書	饒宗頤	三
附錄鄭祖襄《徽字與徽位——兼考古琴徽位產生的歷史年代》	杜祖貽	一
從脂批看整理紅樓夢的工作	宋晞	二九
論抗戰期間大學播遷與西南地區高等教育之發展	二七	二九

論莊子的美學思想

敏澤

四五

南明廣東詩說

黃文寬

六七

唐代古文理論的興起、發展與沒落

金啟華

八五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之歷史成分

柳存仁

九九

中文單字連寫區分芻議

周策縱

一三五

談談語文學習

詹伯慧

一五三

古典文學修養與中文教學

蘇文擢

一六五

古代破讀方法在廣州話中的殘留現象舉隅

鄭文瀾

一七五

談「兩聲各義」

羅慷慨

一八九

附錄：香港中文大學何添樓記

蘇文擢

二二三

弁 言

杜祖貽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肇始於一九六五年，現在是二十周年了。「百年樹人」，二十年只是一段短暫時間。然而由於香港社會急劇的發展和變化，作為文明社會根基的教育事業自然互相配合而一日千里。我們的學院是一所培訓中學各科師資和校政管理人員的機構，在這種情勢的鞭策下，加以社會人士和大學當局的鼎力支持，設備、班制、學科、學額等方面都逐年有所擴充。截至目前為止，歷屆獲得教育文憑的學員共有四千一百多人，獲得教育碩士學位的也多至一百二十餘人。他們畢業後服務於香港或東南亞地區的教育界，並且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這是令人欣慰的事實。預期在學院的新翼舍「何添樓」落成後（按該樓已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啟用），為教學環境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學科也將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當學院已達弱冠之年而新翼舍落成在望的時候，我們編印這本專刊——《數學集》——以資紀念。

我們的學院和一般師範大學學制有所不同，學員都是學有專長的大學畢業生，假定他們的專長已經足以「抗顏爲人師」，然後予以教育理論、教學方法各方面的培訓。就我個人的觀察，學員的素養對於其他學科的教學問題不大，但教學中國語文却是例外。因爲它的課程牽涉到不少專門之學，例如教先秦文學就需要對文字、訓詁、古音的學問有相當的認識；教唐詩、宋詞、元曲

就必須能夠掌握四聲陰陽，而且對於古典詩歌文學相當熟識。諸如此類，確實很不容易了，何況典章文物、禮樂制度、天文、地理、歷史、哲學等也常有涉及呢？這些，在學生來說並不需要懂得太多，但從教師來說却是多多益善。唯其涵養深厚，纔能夠融會貫通，左右逢源，應付裕如。不然的話，就算精通教學的理論，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結果一定捉襟見肘的。

這本專刊雖然只有十來篇專題論著，却包括了語文教學、教育史、古典文學、音韻學、音樂、美學、小說，都出於當代著名專家學者的手筆，博大精深，除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外，更重要的意義是使我們擴大視野，爲我們提供進修和深諳的範例。專刊完全以中國學術爲主而不涉及其他學科，原因在此。

我們衷心感謝吳仲亞先生紀念學術基金資助出版經費，大學校長馬臨教授的鼓勵，饒宗頤教授爲刊物題名並惠賜高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周策縱先生、澳洲國立大學教授柳存仁先生、臺北文化大學教授宋晞先生、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教授潘重規先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侯敏澤先生、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金啟華先生、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詹伯慧先生、廣東文史館副館長黃文寬先生、廣州市教育學院講師鄭文闡先生、澳門東亞大學教授及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羅懷烈先生、本院客座教授蘇文擢先生，均於百忙之中爲本刊撰寫鴻文，珠玉琳琅，感激靡既！更承羅教授主編本集，本院講師余迺永博士、周漢光博士、方鏡熹先生負責校讎，大學出版社馬桂鴻先生設計封面，梁鳳霞女士、葉碧芬女士、曹忠岳先生及王適頤先生協助出版事宜，統此致謝！

說琴激——答馬蒙教授書

饒宗頤

順之吾兄左右：承寄示本年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第四期貴戚鄭祖襄君論《徽字與徽位》一文，屬爲評定。琴之有徽，肇自何時，曩年嘗略注意及之，因乏資料，未敢妄議。若《西京雜記》言「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云云，以其書晚出，素不輕信。淮南子所言，鄭君否定衆視，讀徽字爲動詞；又定嵇康時代方是琴徽始用之年，此則不能苟同，謹陳鄙見如次：

淮南子修務訓：「盲者……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操、拂，手若蔑蒙（蟻蠟），不失一絃。」此處所見徽字，向來琴家無不視爲琴徽出現最早之資料，音樂史家意見多同。（吳釗兄《中國音樂史略》是最新著作，他引證此段文加以說明：「盲人的眼睛甚麼也瞧不見，可是彈起琴來，雙手簡直像上下飛舞的蟻蠟，右手彈，左手按，一點也沒有差錯。」左右手一按一彈，是很對的！）所謂「復徽」，高誘注云：「上下手」，即謂以左手母指按琴面循弦而作進退往復之動作，如無徽位表示其音準之上下音位，則「復」字便無著落。今時彈琴，左手指法尚有上下、引上抑下、進退、綽注、往來、進復退復諸名目，可見此處高說之確。如訓徽爲急彈，則上文已言「參彈」，下文又言「復急彈」，殊爲費解！觀下面淮南又再舉出攫至拂諸動作，亦是彈奏手法，如是重還言之，不成文理。鄭君留意於「徽」字而漠視於「復」字，是其疏也。嵇康琴賦云：「或參譯（即趨趕，相隨貌。）繁促，複疊攢仄。」（攢仄二字用馬融長笛賦語，仄即側。

）可借用以解說淮南「參彈」、「復徵」二事，復猶複疊，即言依其徽位在絃上作「進退復」引上抑下以取聲。繁促、攢側，蓋表現種種之裝飾音，以形成琴韻之美。琴賦中提出撓、拽、揜、持等動作，正如淮南之言撓、援、揜、拂，應為指法之名目，可無疑問。（參看楊時百《琴話》）、祝鳳喈《與古齋琴譜》對此諸名稱之解釋。修務訓又云：「琴或撥刺枉橈」。撥刺即右手指法之一，今簡寫減字作弣。司馬相如長門賦：「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在幽蘭譜中有此指法。如「大指當九按徵羽，卻轉徵羽」楊時百幽蘭古指法解謂「詳其文義，審其音節，即今譜再作之法」，又詳袁荃獻《指法集注》「卻轉」條。（由淮南之語，可知西漢時琴之彈奏指法已相當複雜，琴面有徽位之標識不足為奇。琴之彈奏，一按一彈，左右手實兼用之，鄭君似只知有彈，不知有按。左手之「按」，必須循絃，故以徽位為準。文選李注引淮南另文言，「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此則將徽字用為動詞，即謂鄒忌一按琴之徽而威王悲生終日矣。又引許慎注云：「鼓琴循弦謂之徽」，此十三個標誌音位之小圓點之徽，按純律構成四個八度大三和弦（1351）之泛音列。既是琴弦上取得泛音之音位，亦是琴弦上按音取音之音位依據。彈者左手在琴面移動，須循絃以就其徽位，所以許慎解云：「鼓琴循絃謂之徽」。循絃之「循」，即依其音位上下以取滑音之謂。此適足反證琴之有徽為時已久。若高誘注另訓「徽，驚彈也。」其意似謂鄒忌一接觸琴之徽位，忽遽急彈，而王已悲之終夕，驚彈之義乃從一「徽」動作而來。如是解釋，方為合理，然與「上下手」取義完全不同。總結而言：淮南

子書中言琴「徵」兩次，一言「復徵」，謂在徵位上動作之進退往復，用作名詞；一則作動詞用，謂循絃按徵。二者義實相成，何庸是甲而非乙乎？

又徵之一名，漢人辭賦屢屢見之。楊雄之《琴清英》，今只存殘句，全書不可覩，有無談及琴徵，未由斷定。然其《解難》明云：

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者（嗜），則坐者不期而附矣。（漢書雄傳下）

顏師古注：「徵，琴徵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撫抑之處當指按音引上抑下之徵位，顏說絕無誤！傳毅雅琴賦云：

時促韻而增徵，接角徵而控商。

言循絃按徵位而進退之動作既增，則琴音自成急促之韻。凡復徵、急徵、增徵諸徵字均是名詞。若其用作動詞者，又有下列諸例：

徵 稷康琴賦：「絃以圓客之絲，徵以鍾山之玉。」絃者，謂安絃，徵者，謂緩徵，以名爲動，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之比。絃與徵二字對言，考東漢崔駰《七依》云：

絃以山柘之絲，飾以和氏之璧（全後漢文卷四十四）

此二句出《北堂書鈔》卷一百九琴類（光緒間孔廣陶校本）所引載，因知嵇康之句法即承襲自崔氏。「飾以和氏之璧」句，「徵」字雖省而意指以玉作爲琴徵之飾物甚明。以此知徵作動詞用時，可有按徵、飾徵諸義。

楊雄言「高張急徵」，鄭君之解，殊有未達。淮南子詮言訓：「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

緩」是小絃緊而大絃鬆。陸機文賦沿用急徵二字云：「猶絃么而徵急，故雖和而不悲。」絃么即絃小。么，小也，絃小則音緊；雖和而不悲者，淮南齊俗訓云：「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能悲必彈奏者能將情感投入。說林訓云：「彈一弦（即么絃）不足以見悲」是也。又嵇康琴賦：

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遠故音庫，絃長故徵鳴。

李善法引阮籍樂論佚文云：

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琴瑟之體，間遠而聲埠。

嵇康蓋合楊雄、阮籍之語，而組綴成文。善注云：「絃張謂徵間而絃長也」。間者指絃與絃間之距離，徵間則其間遠，故其聲下；徵急則其間促，故其聲高。琴之爲物，其間遠，其徵間，徵間而絃長，故其聲不如箏笛之高。琴賦言「響逸」、「聲清」、「音卑」、「徵鳴」四事，徵字與響、聲、音比倫，四者均是名詞，徵指音位，絕無疑問，故知楊雄之言「弦者高張急徵」，即謂張之高，徵之急，張高指其弦用轉轉高半律或一律，徵急謂其間促，則聲可不至過於低下。如將上列諸徵字概從鄭君之說不指徵位而一概作「彈」字解之，試問將成何意義！

又按徵亦訓大索，朱駿聲論徵字之轉注義，有云：「琴軫係弦之繩謂之徵，徵急言糾絃也，後人乃以琴面識點爲徵。」（《通訓定聲》系部）夫琴必先安弦，然後按徵位以調音。淮南子覽冥訓：「今夫調絃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可見調弦以取和聲，漢人已慣行之。如無徵位，何從調弦？彼視徵爲軫之絲繩，去事實更遠，無異指鹿爲馬，是烏乎可！

綜上以觀，楊雄、傅毅、崔駰諸人均言及音位之徽，足以解釋淮南「復徽」必指琴面表識音位之圓點，不必別求他解，安得謂徽之使用始於晉之嵇康也哉！我故曰：琴之有徽，西漢已然。雖目前馬王堆出土之琴未見有徽識者，不能以此遂遽斷言漢時無徽而懷疑淮南之言爲不足據。琴徽起源爲彈琴者當前亟欲知之論題，既辱明問，故闡縷闡述之，未敢以爲是，仍望鄭君有以揚榷之。

又記：

鄒忌鼓琴以見齊威王，其事亦見史記田完世家及劉向新序。其人約當周烈王之世。淮南子稱「鄒忌一徽琴」，以徽字用作動詞，可能劉安賓客取西漢琴制來描寫東周琴人鼓琴之狀態。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樂器有五弦、十弦琴各一具，其上均無徽位痕跡。由無徽到有徽之設計，是琴具發展之一重要突破。然何時開始有徽？尚有待於新材料始能論定。

西漢京房爲適應三分損益律，故發明十三弦之律準，其事即等於按三分損益律來設徽。足證十三徽之使用必在京氏之前。古人論徽，以第七徽爲君，居中以象閏。第一徽名太簇以應正月之律，以訖十三徽名大呂，以應十二月之呂，以十二律、呂配十二月，閏居其中。琴自岳山至第四徽長九寸爲黃鐘，自第四徽至中徽（即七徽）亦九寸，即一倍黃鐘之律。（見《太古遺音》論徽一七徽至十徽下訖於龍齦，亦可分爲二個九寸，各得 $\frac{1}{4}$ ，此十三徽初步區劃之用四分法也。若用三分法，則岳山至五徽爲 $\frac{1}{3}$ ，五徽至九徽爲 $\frac{1}{3}$ ，以下訖龍齦上爲 $\frac{1}{3}$ 。自管子地員篇已論三分損益，呂覽言十二律相生以配十二月。十三徽之制定，自然與此種樂律理論息息相關，琴徽與三分損益律之關係既明，其孕育年代不難測知。

琴有三音，爲散聲、泛音、按音。《太古遺音，琴議》、保存古之《三聲論》云：「夫泛聲應徽，不假抑按，自然之聲，是爲天聲。天聲、清也；律應氣於地，絃象律管入地之淺深，而爲散聲之次第，是爲地聲，地聲、濁也；按聲抑揚於人，人聲、清濁兼有者也。……天聲出於地聲之上，人聲出於地聲之下，是謂天地人，此言其分也；人聲雖在絃下而指按絃上，是謂天人地，此言其勢也。」取三才之說以解釋琴之三聲。此種理論，以莊子齊物論之區別天籟、地籟、人籟比方之，疑戰國初年即有此說之萌芽。其以三音傳會三統，則自是晚出漢人之說。天聲之泛聲出於應徽，在一條弦上之十三徽位所發出之泛音，以音高論，本只有 c、g、c₁、e₁、g₁、c₂ 六個音（以七徽居中，上下兩部分之相對音高相同。）七條弦在十三個徽位所取之泛音共九十一個。而地聲之散聲，自第一弦至第七弦只得七音；按音則進退往復，難以計數。泛音必在徽之上，故有徽然後有泛音。嵇康之廣陵散，後世流傳者爲慢商調，全譜共三千左右音，其中徽與徵間之按音只有七十餘，而絕大多數爲散聲及泛音，足見作曲者對於泛音之愛好及重視。泛音以指輕點弦上，抑之則全弦分爲若干節之振動，以成泛音。凡振動相等者，其音之高下必相等，是爲同音徽。如 4 與 10 徽，1 與 13，5 與 9，2 與 12，3 與 6，8 與 11，皆爲同音徽。細分析之，4 與 10 徽之泛音爲 7 徽泛音之倍音，1 與 13 徽之泛音爲 4 與 10 徽泛音之倍音，2 與 12 徽泛音爲 5 與 9 徽泛音之倍音，如是則爲倍音徽，仍是高下相應之同音。琴之調弦取其同聲相和，已詳《淮南覽冥訓》，知西漢人調弦必有取於泛音之同音徽及倍音徽，故其時必有徽，始能收調弦之效，此爲理之易明者。

說苑記「應侯與賈午子坐，聞鼓琴。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賈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楊時百《琴話》引此段加以解說云：「疑此不在指法律呂，而在絃徽。如以正調變音彈慢三、慢一三六之類，即不轉絃而換調之明證。」凡弦之振動與其長度成反比，長度大者振動必慢，反之，長度小者，振動必快。「張急」即指長度小者，其弦之振動已快。若取其變音，則更能動人。長門賦言「援雅琴以變調兮」、分明用「變調」一詞。楊時百爲大琴家，深明琴理，其解說「調下」二字爲由正調變慢，即指降低一律如慢宮爲角之類。琴以換調而分別爲正弄與側弄二種，凡基音按徵、羽、宮、商、角、徵、羽（此以第三弦爲宮）之音階次序排列之各調者爲正弄，不改變原調定弦而奏以他調者，稱借調側弄。側弄爲借調而不改動原調定弦，即楊氏所指在「絃徽」上用力之功效。楊氏所舉之例，明人稱爲外調，茲就《西麓堂琴統》試舉一例：

無媒調：慢三、六各一徵。
〔廿六〕_上句

應 〔廿二〕_中句

在袁均哲《太音大全集》中，無媒調爲慢角慢六一徵。姜白石自度西《徵招》小引云：「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無媒調在定弦上五弦是黃鐘均，（宮、商、角、徵、羽）。下六弦即姜夔所謂，具母弦而不用之林鐘均（徵、羽、宮、商、徵）故樂家演奏黃鐘均與林鐘均相犯之曲調，用無媒調最爲合宜，此其一例。他如楚商之淒涼調，（琴曲離騷、楚歌、澤畔吟皆屬此一系）亦屬包含多種調交替爲用之曲調，有人取與西北民歌曲梆子腔劇之花音，歎音相對之苦音、哭音相比擬，湘州音樂中，與輕三六相對之重三六諸調，樂音結構與淒涼調極相似。琴曲之構成悲音，其道

理正是如此。故知變調之重要，如無徽位，以作準則，如何可不改弦而能換調變慢？從以上種種理由，可以說明漢代琴面上必有徽以作琴律取音之準則，揆之史實及事理，無不若合符節，否則許多有關琴事之紀載將無法理解，故爲補充說明如此。

節錄：「徽」字與徽位——兼考古琴徽位產生的歷史年代

鄭祖襄

近些年來，古琴徽位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興趣，因爲它不只表明古琴樂器的發展完美，也反映了古人對弦上泛音的認識。苦於迄今沒有發現確鑿明白的歷史證據，古琴徽位產生的歷史年代尚難定論。研究者們從一些零星側面的史料上來分析判斷。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分歧主要表現在對史料的理解上。筆者在學習研究古代音樂史中，尤感對待史料科學態度的重要，就此問題作一考證。

《西京雜記》的「璠璵之樂」

舊題西漢劉歆《西京雜記》中，有一段論及琴徽的話：「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①』」。如果依據這段話，可以把琴徽產生推至漢初，甚至更早②。但《西京雜記》不是信史，它是一本帶有怪導色彩的軼事小說，作者是東晉葛洪（公元二八三年——三六三年），托名劉歆。文學界對此是有定論的③。葛洪是東晉有名的道士，所述神仙鬼怪奇導荒誕之事自不必說。實際的

是，東晉葛洪的時候，古琴徽位已經產生。比他稍前的嵇康（公元二二四年——二六三年）所著《琴賦》中有「徽以鐘山之玉^④」之語，說明嵇康時代古琴已有徽。葛洪看到的古琴是有徽的，所以他描寫咸陽宮的「璠璵之樂」也就有徽了。實際的古琴是七弦十三徽，「璠璵之樂」有十三弦二十六徽。把徽數作爲弦數，把徽數增添一倍，葛洪想像誇大的依據和思路還很清楚。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一張漢初古琴，琴上只有七弦，沒有徽位。證明漢初古琴還沒有所徽。《西京雜記》這條記載是不能作爲史料來相信的。

《淮南子》「參彈復徽」的注

西漢劉安（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二二年）著《淮南子》中有一段描述演奏古琴的話，其中用到了「徽」字。《淮南子·修務訓》：「……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⑤」。東漢高誘^⑥注云：「參彈」，並弦。「復徽」，上下手。「攫援」，掇也。「標拂」，數也。有的同志認爲，這裏的「徽」字應該根據高誘的注釋，不宜作琴徽來理解^⑦。有的同志認爲，「參彈復徽」是參差地彈着按到一定的徽位^⑧。如果把這裏的徽字認爲是言琴徽，也就把古琴有徽的年代推到了西漢。

「徽」字在漢代歷史時期應該作何解釋呢？

東漢許慎（公元五八年——一四七年）所著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云：「徽，衰幅也。一曰三糾繩也。從系。微省聲」。衰，邪的異體字。邪幅，即行縢，裹腿布。三糾繩，

清·段玉裁注^⑨：「三糾，謂三合而糾之也。」牛部曰：「糾、三合繩」。這裏沒有談到「徽」字有標誌或琴徵的含義。

《淮南子》這部書，在高誘之前，許慎曾經作過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也」。許慎注《淮南子》早已不見，不過湊巧的是，唐·李善《文選》注中恰恰保留了一條許慎注《淮南子》中「徽」字的注。《文選·文賦（陸士衡）》：「擾弦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李善注：「《說文》曰：么，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慎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鼓琴循弦謂之徽」，這是許慎對徽字的注釋。再看高誘「鄒忌一徽琴」的注，曰：「徽，驚彈也」。驚，是疾的意思，同驚假借。驚彈，即為急速地彈奏。許、高這兩個注基本相同，與高誘「復徽」注也相符合。上手下手是一種演奏手法，也是指彈奏。因此，從西漢劉安到東漢許慎高誘，演奏古琴用到「徽」字是指循弦而彈，或指急速地彈，並無琴徵的含義。

那麼琴徵為甚麼要用徽這個名稱呢？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中有一段話：「……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而不能送之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西晉杜預（公元二二二年—二八一年）《春秋左傳集解》云：「徽，識（音 zhì）也」。唐·孔穎達疏：「（漢）鄭玄